

## 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要求及影响因素

林文艺<sup>1,2</sup>

(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2.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福州 350012)

**摘要:**英文版《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发行的专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刊物。从分析该英文杂志从创刊初期至2001年各年代作品选译的情况看,作为政府主办的对外宣传的刊物,该英文杂志在翻译选材上服从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同时也体现我国文艺发展、变化的轨迹。杂志译介的作品虽然带有时代痕迹,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增强我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英文版《中国文学》;文学作品;选择;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1)04-0058-05

从1951年创刊至2001年停刊的英文版《中国文学》<sup>①</sup>(Chinese Literature)(下文简称《中国文学》)刊物,历经整整半个世纪,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是建国后国内最早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以书代刊的杂志。该英文刊物在向外传递和宣传中国文学作品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做出很大贡献。一大批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通过这份杂志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该杂志译介的内容不仅涵盖了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电影剧本等,还对外介绍文艺界的动态,艺术家、作家的专访以及古今著名画家的作品。因此,《中国文学》是英语国家和人民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努力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向西方展示自我塑造的中国形象,促进了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为使中国文化中的珍宝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了解做出一定的贡献。那么,作为政府主办的外宣刊物,其作品的选材方面是否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呢?

### 一、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分析

根据英文版《中国文学》各期所译介的文章,其翻译选材在不同年代侧重点有所不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创刊初期作品选译情况

《中国文学》1951年初创时,一般不接受投稿,

而是编辑从全国及各省市地区的重要文学刊物上选稿或向作家本人约稿或主要是由译者提供稿件。曾任《中国文学》中文编辑的吴善祥提到,当时中文编辑部人员每天要翻阅大量国家级和各地区的重要文学刊物来选作品。有时也向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约稿,如久居中国的新西兰籍社会活动家 Rewia 就曾应邀为《中国文学》翻译了一些作品。创刊初期除了《王贵与李香香》和在国际获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在当时全国影响很大是适应形势需要选择翻译之外,其他作品大部分是按编辑意愿、译者早已翻译或正在翻译的作品及从国内其他报刊杂志上选中的,如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离骚》、沙博理先生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等。<sup>[1]</sup>

根据担任该英文杂志编译人员多年的杨宪益先生回忆,《中国文学》创刊初期,选译的作品一般由当时的副主编叶君健审定。由于刊物起先挂靠中国作协,后归属外文局,在每期内容的选择上,特别是现代作品的选择上,叶君健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及文联的意见,与一些领导与作家进行商量,茅盾、刘白羽、袁水拍等都曾参与其中,热心地提出建议。1955年以后选题题材相对比较多样性,包含小说、诗歌、散文、文论、戏剧等。<sup>[2]190</sup>

#### (二)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的选材

1. 服从政治需求,选译反映建国后中国人民社

收稿日期:2011-04-18

作者简介:林文艺,女,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2009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翻译研究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2010年度A类课题“对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学》(英文版)的研究”(课题编号:JA10311S)研究成果。

会生活的作品。

刊物在 50、60 年代(文革前)主要选择了反映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作品:1951 年选择了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Wang Kuei and Li Hsiang-hsiang),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Daughters and Sons),刘白羽《早晨六点钟》(At Six a.m.);1952 年译介赵树理的写实作品《登记》(registration);还有 1961 年第 3 期选择在新时代有影响的、歌颂新型农民的沙汀的《你追我赶》(The Contest)等。

2. 选择与时代文学发展主潮一致、体现我国文艺政策发展与变化轨迹的作品。

(1)《中国文学》选择了体现我国文艺政策、文艺发展与变化轨迹的相关文章: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The Practice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in Chinese Art and Literature, 1951);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改造思想》(On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of Writers and Artists, 1953.1)和茅盾《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Remould Our Thought to Serve the Masses, 1953.1);周扬《十月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e, 1958.1)等。

(2)选择与时代文学发展主潮一致的作品也是杂志选材的一个标准,例如,50 年代的通讯报告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主题的文章在该英文杂志 1951 年(第 1 辑)得到译介:魏巍《朝鲜前线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冬天和春天、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Reports from the Korean Front),刘白羽《朝鲜在战火中前进》(Flames Ahead),丁玲《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To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in Korea)等。1956-1966 年是我国建国后散文创作活跃的第二个阶段<sup>②</sup>,被杂志选译的散文有:杨朔《樱花雨》(A Shower of Cherry Blossom, 1961.9)、《海市》(Mirages and Sea-Markets, 1960.12);刘白羽《青春的闪光》(The Glow of Youth, 1959.11)、《日出》(Sunrise, 1960.11)和《长江三日》(Three Days on the Yangtse, 1961.6)等。

(3)1949-1957 年间戏曲变革最后成果“推陈出新”的精品剧目典范也顺应形势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刊译:昆曲《十五贯》(Fifteen Strings of Cash, 苏昆剧团演出, 1956.4)、川剧拉郎配 (Brides Galore,

1959.7)、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The White-haired Girl, 1953.2)等。

(三)20 世纪 60 年代(文革期间)的选材

虽然《中国文学》在“文革”期间没有停刊,但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声筒”,所刊发的作品不再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名篇,而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The Red Lantern, 1970.8)、《沙家浜》(SHACHIAPANG (a revolutionary Peking opera) 1967.11)、《智取威虎山》(Taking Tiger Mountain by Strategy, 1967.8)等,以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小说、批判文章,诸如批判老舍的小说《猫城记》、《反“孔”战争最前线》等荒唐文章。“文革”期间,翻译选材单调,多涉及“高大全、红光亮”式的英雄形象及狂热的个人崇拜。<sup>③</sup>例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Hold High the Great Red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 Socialist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Long Live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Midst of High-Tid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8)等。

澳大利亚读者德怀特来信是对这一时期该英文杂志刊发文章的评价:也许你曾放弃阅读《中国文学》,并且再不碰它了。有一段时间它的基调很乏味。短篇小说看起来千篇一律,只是名字不同,人物是用纸版刻出来的僵化木偶人——完美无缺的干部农民与一无是处的走资派相对抗。

(四)文革后至 70 年代末杂志翻译选材情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中国文学》除了恢复适量选译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主要及时大量地译载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文学作品,包括歌颂祖国和理想、伤痕和反思、寻根和历史、悲壮的知青生活、开拓者、创业者、舍己为人的知识分子、爱情和婚姻、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探讨考察人性、生态平衡问题等文学作品。<sup>④</sup>许多有影响的小说诸如宗璞的《弦上的梦》(Melody in Dreams, 1979.8)、刘心武的《班主任》(The Class Teacher, 1979.1)、黄瑞云的《老马和小马》(Three Fables, 1979.8)、贾平凹的《果林里》(The Young Man and His “Apprentice”, 1978.3)、姚雪垠的《李自成》(节选 Battling South of the Pass, 1978.4-6.8)等等,诗歌有郭小川

的《团泊洼的秋天》(1977.5-6)、李瑛的《一月的哀思》(Poems, 1979.10)、艾青的《光的赞歌》(Ai Qing's Poems, 1979.6)等,剧本如苏叔阳的《丹心谱》(1978.10)、宗福先的《于无声处》(My Wish, 1979.4)等都在这一时期得以介绍。

#### (五)20世纪80年代的编译情况

20世纪80年代,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后,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改革,以期更好地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学:

第一、增设栏目:杂志增加了“To Our Readers”(致读者)一栏,内容包含译作的简介、栏目和版面更新、变化说明等,方便外国读者的预览。该栏目的意图从杨宪益的文章《〈中国文学〉三十年》可领略到:“我们的读者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他们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对杂志有不同的要求。有些读者对学术氛围浓厚的中国文学感兴趣并进行研究,有些读者则希望杂志社的编辑人员能够使作品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为提高国外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译介的作品既有学术性又有普世性,成为所有人都喜欢的作品。我们相信,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能够超越时空,散发出无穷的魅力。”<sup>[6]</sup>

第二、拓宽选材范围:除选择传统的中短篇小说、节选长篇小说、诗歌、戏剧剧本外,《中国文学》也选译了中国传统曲艺体裁——相声、游记、回忆录、民间寓言、民间故事等作品。有关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访谈和中国文学、艺术的最新动态亦同时体现在其中。翻译选材范围更广,体现了时代感和民族特色。谶容、从维熙、蒋子龙、高晓生、陈忠实、贾平凹等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和莫言、残雪、阿城、扎西达娃等先锋作家及古典文学作家蒲松龄、罗隐、沈括、袁枚等的作品都得到了介绍。<sup>[6]</sup>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Manager Qiao Assumes Office, 1980.2)、茹志娟《草原上的小路》(The Path Through the Grassland, 1980.3)、谶容《人到中年》(At Middle Age, 1980.10)、高晓生《陈奂生上城》(Chen Huansheng's Adventure in Town, 1980.12)、汪曾祺《受戒》(The Love Story of a Young Monk 1982.1)、邓友梅《寻访“画儿韩”》(Han the Forger, 1982.6)、张贤亮《绿化树》(Mimosa, 1985.1)、阿城《棋王》(The Chess Master, 1985.2)、冯骥才《神鞭》(The Miraculous Pigtail, 1986.1);诗歌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Poems, 1980.10)

等诸多作品都是当时译载的有影响的作品。

80年代初,在杂志主编杨宪益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杂志社在出版《中国文学》杂志的同时还推出了英文版的“熊猫丛书”,以更多地对外介绍中国作家的经典作品。许多作家诸如池莉、冯骥才、方方、邓友梅、贾平凹、刘恒、梁晓声、刘绍棠、王蒙、张洁、张贤亮、周大新等作家的作品被收入到“熊猫丛书”中。中国作协经常把“熊猫丛书”赠与来访的外国作家。<sup>[6]</sup>

(六)20世纪90年代至停刊,杂志的作品选择情况

受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在欧美地区的发行工作大大受挫。20世纪90年代杂志的作品选择有一些变化,主要是以专题出现。从1994年开始,《中国文学》跟以往的编排有所区别,以分类的专刊形式发行,即每一期都以相对集中的题材或流派编成一个专号,如“青年女作家专号”、“传奇文学专号”,例如,钟树芝的《巾帼英雄的传奇故事——关于〈木兰诗〉》(1994.1)、“爱情婚恋专号”等等,并有专门文章从理论上全面分析介绍本专号的内容特色和编辑思想。例如,为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1995年该杂志编辑了“抗战文学作品专号”的夏季号。1995年秋季编辑了“女作家女艺术家专号”,并配有评论文章,例如,吴宗蕙《各具特色的女性文学新作》、何国立《艺术中的她们和她们的艺术》等以配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冬季则编辑了“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专号”,刊载了藏族、蒙古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介绍土家族民俗风光及西藏传统绘画的图画和文章。例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头巾》、蒙古族诗人查干的《默读祁连山》、《维吾尔族少女》等。杂志还专门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例如彭万廷、刘君励的《一部富有山野情趣的民族歌舞》,土家族大型歌舞《土里巴人》、蒙古族作家、评论家编写的文章等,详细地介绍了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情况,使国外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成就及民族政策。<sup>[7]</sup>

再如,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文学》特选译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1997.3)、电影剧本彭新儿、苏岳案的《鸦片战争》(1998.3)等。1999年推出的“国际汉学”栏目(例如(法)霍尔兹曼的《王维的〈桃园行〉》,1999.3),目的是希望从海外汉

学家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四杰的诗、边塞诗、古今山水诗、花间词、志怪小说、笔记小说、话本小说等,更富系统性和连续性。<sup>[3]</sup>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发行量从数万册锐减到3000册左右。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中国文学》于2000年全面改版,改版后由季刊变为双月刊,由英文版改为中英对照版。新版推出后,各方反响较好。尽管如此,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纯文学刊物的英文版《中国文学》还是于2001年停刊,成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道远逝的风景。

## 二、影响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的因素

《中国文学》杂志办刊主旨是对外介绍中国文学,作为官方主办的对外宣传刊物,它在翻译选材方面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

### 1. 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

从上述有关《中国文学》作品译介选材的分析,我们看到作为对外宣传的刊物,服从政治需求、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是影响杂志选材的主要原因。以1951年发表的作品为例,1951年总共发表13篇文章,其中,服从政治需要的就有10篇,占这一期总数的76%,其他的只占24%。从杨宪益先生的这段话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其实,乃迭比我工作得更努力,她独自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在选材方面还算是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我们常常要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方能达成妥协。”<sup>[2]190</sup>

### 2. 为配合国家外交需要

配合外交需要也是《中国文学》选材的一个要求,它经常选译一些与政治外交(政策)相一致的作品。例如,中国与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于20世纪50年代末日益频繁,《中国文学》杂志也适

时翻译了相关作品:1959年第1期叶君健的《亚非作家的节日》(A Festival of Asian and African Writers)和陈杰克的《伊拉克的艺术在北京》(Iraqi Art in Peking);1960年第8期周而复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之交》(Literary Ties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1960年我国与古巴建交,《中国文学》1960年第7期就译介了肖三的《古巴,我给你捎句话》(Cuba, I Salute You)和袁水拍《加勒比海一枝花》(Flower of the Caribbean)等作品。

### 3. 旨在对外宣传国家文艺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国文学》的翻译选材亦体现我国文艺政策发展与变化:例如上文提到的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1951.1)、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改造思想》(1953.1)、茅盾《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3.1)、周扬《十月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1958.1)和邵荃麟《两个文艺思潮的斗争》(1958.1)等文章都显示了这种变化。

### 4. 必须符合当时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

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也是影响杂志选材的一个因素。《中国文学》对一些虽然与现实生活题材有关,却因为作品里涉及到爱情或纯娱乐性的东西,比如说性爱方面的描写则不予以录用。杨宪益说“当时他根据原版本译好《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该作品中有几处是性爱情节的描写,但在审稿时该小说被删除未能出版,体现了我国当时正统保守的审美观。美国读者瓦乐莉·迈纳在美国报刊《在这个时代》(1983年11月23日)上撰写“中国女作家的生活、工作和希望”的评论时说“在同《中国文学》杂志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中,总编杨宪益告诉我们,只要你不写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在中国发表作品是很容易的,他没有进一步阐述,但是后来我们听说对性细节的描写一般都是受到查禁的,当西方作品被翻译过来时,性描写的段落往往要被简化或删除掉。”<sup>[2]191</sup>这些反映了我国文学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还与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当时人们正统、保守的一面,也体现了《中国文学》(英文版)在选材上展示新思想、新面貌,保留了传统的儒家美学观念。

## 三、结语

英文版《中国文学》作为政府主办的对外宣传的刊物,其翻译选材主要是服从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宣传国家文艺发展、变化的历程,必须符合当时

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和为配合国家外交需要等,但它本着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精品的办刊宗旨,向国外介绍了我国古典文学及现当代优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而很少外译中国文学的不平衡状况,在新中国文学外译史上起到奠基石的作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

注释:

①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1951年10月创刊,初期为不定期丛刊,1954年起改为季刊,1958年为双月刊,1959年为月刊,1964年增加法文版,此后英法两种版本并存,1984年恢复季刊,2001年春季停刊。文章中出现的作品都是参考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1)各期刊物中选译的作品。

②本文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参考了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参考文献:

[1]田文文.《中国文学》(英文版)(1951-1966)研究[D].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9.

[2]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M].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3]何琳,赵新宇.《新中国文学西播前驱——《中国文学》五十年》[N].中华读书报,2003-09-24(3).

[4]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J].对外大传播,2007(8):48.

[5]何琳,赵新宇.“卅载辛勤真译匠”:杨宪益与《中国文学》[J].文史杂志,2010(4):15.

[6]陈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J].湖南社会科学,2008(3):158.

[7]郭林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架起桥梁[J].对外大传播,1996(3):12.

[责任编辑:江清悠]

##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English Version

LIN Wen-yi

**Abstrac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periodical issued by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which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the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 countri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o 2001. As a publication of external publicity,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beyed the requirements of politics in selecting and translating the works, it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s of policies in culture and arts. Though the publication was impressed with the times, it made a contribu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of English version; literary works; selection; translation